

中央苏区时期的水利工作实践

□ 王卫斌

土地和水资源的特殊性决定了它的公共性,本该且必须归于全体社会成员公有共用,必须且只有交由国家代表国民占有,交由政府代表国家管理,才能实现它的公共性。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蒋介石集团背叛了孙中山先生“天下为公”“耕者有其田”的政治理想,放弃了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人在全国范围内举行了一系列武装起义,党的工作重点逐步由城市转入农村,开启了实质性废除封建土地制度、变革旧生产关系的土地革命新阶段。

中央苏区各级党政紧随土地革命的发展进程,重新确定水利所有权和使用权,并加以制度化和法律化。1930年2月,红四军前委、赣西特委联席会议审议通过《赣西南苏维埃政府土地法》,规定武装夺取政权成功后,须立刻没收一切剥削阶级的田地、山林和池塘,归苏维埃政府公有,分配给贫苦农民。不便分配的河坝及大规模池塘,归苏维埃政府管理,“供给人民公共使用,并督促人民修浚整理”。同年3月,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审议通过《土地法令》,规定所有池塘由苏维埃政府没收,出租给农民畜养水产物,与水利消防相关的池塘应以水利消防为重。所有陂圳、水车由乡政府管理,水流连贯数乡的陂圳应由各乡组织管理委员会共同管理。上下相连、水利相通的田地应准许水流畅通,新开水路经过的所有地方,“无论何人不得借故阻挠”。1931年12月1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认为“土地与水利的国有,是彻底消灭农村中一切封建关系,而事实上就是使农村经济达到高度的迅速的发展必经步骤”,规定一切水利、江河和湖沼,“由苏维埃管理,建设来便利于贫农中农的公共使用”。

据不完全统计,中央苏区时期各级党政制定颁布的各类法规文件多达775件,其中有一半多涉及到农林水利。通过明文立法、审慎发令,为有关部门治水管水提供了根本遵循,为农民群众用水兴水提供了可靠依据。在土地革命和苏维埃政权强大的威力扫荡下,中央苏区反

动的封建土霸水霸被打倒,落后的封建水权水规被取消,狭隘的封建水利界限、水利共同体被打破。水利矛盾纠纷还原了地主剥削农民的真实关系,增强了农民的阶级兄弟意识和团结协作精神;水利资源回归了它的公有属性和共用职能,减少了人为浪费损失,扩大了有效灌溉面积;广大贫苦农民掌握了基本生产资料,提高了发展农业生产的内生动力和能力,由此也就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生产力。

中央苏区地处武夷山、南岭和博平岭等山脉之间,位居赣江、珠江和汀江、闽江、九龙江等水系的源头,境内群山绵亘、水网密布,素有“种一年吃三年”的说法。但在封建社会时期,自县以下都没有专门的水利管理机构,水利事业主要由民间自建自管,抵御水旱灾害的能力极其脆弱,基本上处于“靠天吃饭”的状态。毛泽东和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脱离弹丸之地井冈山,经过浴血奋战取得了中央苏区局部执政地位后,党和苏维埃政府开始把农业生产建设和水利建设提上了重要议事日程。

1932年2月8日,临时中央政府颁布关于春耕的训令,强调春耕和农业生产是“苏区国民经济的主要部分”。1933年4月22日,中央土地部发布《怎样领导夏耕运动》的指示,强调“水是稻田的命脉,无水则人工肥料都成白费”。同年7月24日,中央执行委员会作出党的任务的决议,强调“利用冬季农闲时节进行大规模的河道水利灌溉之修与增添,是保证明年春耕运动胜利的前提”。1934年1月24日,毛泽东在苏维埃大会上进一步指出,“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我们也应予以极大的注意”。

为了集中力量粉碎国民党的第四次军事“围剿”,确保群众安全耕种,1932年12月28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苏区全境提前春耕,要求各级政府须协同各群众团体,动员全体群众,在农历正月内犁好所有耕地、修好一切河坝,最先完成任务的乡和个人由县区政府给予奖励。1933年2月1日,中央土地部训令区乡土地部立刻展开调查统计,摸清陂圳、河堤、池塘和水车等水利设施的

情况,计划好修理、开筑和挖深等水利工程所需的人工、材料数量,按照轻重缓急分别发动群众捐钱捐工,并限定在3月份之前一律修好、开发好。

毛泽东亲自规划中央苏区的水利工程建设,制定了提高4尺、底宽7尺、顶宽3尺的堤防设计标准,带领干部群众在瑞金县叶坪乡马山村拦截古城河,修筑了自明代以来多次动工均未告竣的东华陂,灌区1.28万亩田地得到有效灌溉。中央土地部代部长邓子恢亲自出席瑞金县各土地区部长联席会,参与讨论、制定春耕运动的具体计划,以及解决水利耕牛农具等问题的具体办法。中央苏区各级党政在财政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依然大幅降低农业税负,持续加大水利投入,全力救助受灾群众。

截止1934年夏耕夏种结束,中央苏区各地修复和新开的大小水利工程已达万余处,仅新开挖的水塘就有三千多口,初步配套完善了蓄引提排灌系统。其中瑞金县修复和新开陂圳2340座(条),新开水塘85口,修复和新造筒车水车545架(乘),有效灌溉面积达94%。兴国县修复和新开陂圳869座(条)、水塘233口,修复和新造筒车水车71架(乘),13万亩田地得到有效灌溉。福建省长汀、宁化和汀东三县修复陂圳2366座(条),新开几十座(条)。粤赣省修复和新开陂圳4125座(条),仅会昌县就修复了1035座(条)。

中央苏区各地在连续遭遇60年未有水灾、百年未有旱灾的情况下,农业生产依然逆势飘红,普遍恢复和超过了土地革命前的水平。1933年,赣南闽西区域水稻主粮的产量平均增长了15%,番薯、芋子和豆子等杂粮增长了20%。1934年秋收季节,由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处于战区边区地带的粮食损失了不少,但平均收获量仍比上年增长10%左右,其中赣南增长了15%,粤赣增长了20%。水利建设在减轻水旱灾情、增加农作物产量的同时,又间接促进了养殖、商贸和水运等相关产业的发展,极大地充裕了革命战争的物质基础,改善了苏区军民的基本生活。



南梁地区的党建工作

在群众工作蓬勃发展的同时,南梁地区的地方党组织建设工作在刁仲勋、张策、惠子俊、张秀山、马仰西、高岗等人的负责下逐步开展起来。在此期间,陕甘边区红军主力部队也开展了建党工作。

当时,陕甘边区党和红军在南梁一带开展地方党组织建设工作面临许多困难和挑战。这里地域偏僻,群众接触到的新思想、新文化、新观念很少,而封建社团组织相当普遍,哥老会、天门会、释教会等会道门组织很流行。这些组织带有浓厚的封建思想。因此,在南梁地区发展党的地方组织必须坚持积极稳妥的方针。一方面,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巩固需要建立党的地方组织;另一方面,在党的地方组织建设上,必须克服“左”倾错误的干扰。否则,“如果盲目地大量的发展党的组织,不但不会建立强有力的组织,相反会把党葬送在这些封建的污泥坑中,这在当时是不能不注意的事情。”

因此,刁仲勋、张策、吴岱峰、高岗等刚到这里时,首先从群众的切身利益出发,提出分牲口、分粮食、分土地、打土豪、取消苛捐杂税等口号。在这些口号下,发动群众斗争,建立群众组织,逐渐地培养党的积极分子,发展地方党的基层组织。

1934年一二月间,刁仲勋、张策在南梁白马庙一带发动雇农群众,组织工会,选举张钦贤为工会会长。工会主要做雇农的工作,发动长工向地主作斗争,要求增加工钱、换衣服等。同时,在白马庙发展张志德、张钦贤、张志福、李元恒4名党员,建立了南梁地区第一个农村党支部——中共白马庙党支部,张志德任支部书记。后来,牛永清、武生荣、郝文明、贾生秀、白天章、边金山等一批南梁地区贫苦农民积极分子入党,为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巩固提供了党的组织保证。

1934年春,刁仲勋、惠子俊、张秀山、强家珍、马仰西等在开辟庆北苏区的同时,积极发展党的组织,建立了杜家河、武家河、城壕川等3个党支部,杜家河党支部书记李培福,武家河党支部书记高登洲,城壕川党支部书记黄兴仁,共发展党员50余名。此外,在柔远川以及西岭等地,也建立了一些党小组,发展党员10余名。

党在合水县的基层组织建设也很出色。早在1932年春,刘志丹就派共产党员黄德明到葫芦河一带宣传革命,筹建农会、赤卫队,发展党组织。同年6月,正式成立石马坪农会和葫芦河赤卫队。黄克秀任农会会长和赤卫队队长。1933年3月,在红二十六军和黄德明的具体帮助下,葫芦河赤卫队扩建为东池赤卫军大队,黄克秀任大队长。1933年6月,经黄德明介绍,黄克秀光荣入党。8月,正式成立合水县第一个党支部——中共葫芦河党支部,黄克秀任支部书记,有党员15人。1933年冬,刘志丹在合水县连家砭和老城发展党员4名。葫芦河党支部辖赤卫军大队、葫芦河、枣刺砭、安子坪、连家砭5个党小组。这些基层党组织的建立,在巩固根据地和动员群众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文章节选自《南梁革命根据地史》)

丝路览胜



山丹峡口古城

□ 刘志宏

明朝中晚期内阁首辅杨一清曾三次出镇西北边关,途径山丹峡口关寄宿,留下《山丹题壁》一诗:“关山逼仄人踪少,风雨苍野色昏。万里一身方独往,百年多事共谁论。东风四月初生草,落日孤城蚤闭门。记取汉兵追寇地,沙场尤有未招魂。”为山丹古城增色不少。

据记载,山丹峡口历史记载最早起于汉代,称泽索谷。刘昭帝(刘弗陵)始元二年(公元前85年),为防御匈奴入侵,置日勒都尉,屯兵设防,移民屯田。明清时期扩大防卫,属山丹卫管辖。峡口古城面积约19万平方米,开南、北门,有瓮城,北门外有外城,四周有护城河。这座古城和东北边的明长城连为一体,形成严密的防护措施。城中有过街楼,上书“威震乾坤”的匾额。过街楼因年久失修,看起来比较沧桑。峡口古城地处焉支山余脉和北部山峰夹持的峡谷当中,地理位置非常险要。

峡口古城是甘凉古道上至关重要的一处古城关隘,肩负着官吏接待、军粮供给、通邮通商等职能,政治、军事、文化地位十分突出。唐时,这里设和戎城。明、清时期,峡口关皆为设防、商旅和驿传重地。各朝代去往西域的车马人等,历经此地,必须经过此处关隘。据《重刊甘镇志·兵防志·军制》记载:“明代山丹卫原额兵六千七百七十名,实际一千五百五十一名”。《重刊甘镇志·兵防志·堡寨》记载:“山丹卫领堡一十有六”,而“石峡口堡”一堡就有“轮戍兵常额二千二百二十八名,实在兵七百二名,其中骑兵六百三十七名”。由此可知,驻守峡口的实际兵员主要以骑兵为主,是山丹卫总兵员的近一半,有着较强的战斗力。峡口古城除了军事作用,还负责邮递传递。峡口古城曾设峡口驿,峡口驿置甲军40名,骡马21匹,车牛23辆,专司邮递。峡口古城东、西10里的地方分别设停云铺和丰城铺,专门负责邮递传递,直至清朝。如今,这里的古营盘、硝堆、敌角墩、栈道、古长城、烽火台、接官厅等遗址清晰可辨,影射出当时峡口城屯兵设守、刀光剑影、风烟如云的古驿景象。

峡口古城有“甘凉咽喉”之称。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刑部郎中陈巢巡视河西防务,途径峡口古城,见此地处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写下“锁控金川”四个大字,并嵌刻于巨石之上,其字大如斗,现已成为峡口古城的一处人文胜迹。清末左宗棠率部收复新疆,途径山丹的时候,曾手书“周小泉故里”,刻石立记于山丹小东门之外。如此险要的关隘,自然少不了历史上许多名人驻足,张骞、霍去病、哥舒翰、赵破奴、唐玄奘、陈子昂、王允中、林则徐等,都在这里或战斗、或戍边、或路过歇息,让峡口古城产生了许多传奇的故事。千百年来,一批又一批戍边将士,守卫着祖国的西陲边疆,为这片土地的安定团结作出了贡献。

清末关于峡口驿的资料显示,当地除驻军外,有居民79户,399人,却有“代、贴、脱、车、翟、房、唐、李、杨”等40多种复杂的姓氏。居民大都为历代随军家眷,他们皆为军户,不事农耕,子女长大除当兵外,大部分人专做饮食、贸易等生意。城内街道两旁开设馆堂、店铺,共有十大字号店铺。根据峡口古城遗存的文化实物考证,这里还曾制造马具和生产芒硝,用来熟制加工动物皮革。这些都与长期驻军有关,应该是历史形成的货源供应市场。

历代文人学者,赋咏峡口古城的诗词歌赋有30多首,其中唐代诗人陈子昂“峡口大漠南,横绝界中国”;明代岳正“石峡崕崕胜禹门,万年古迹至今存。两山张披如鸾峙,一水中流似马奔”;清代诗人谢历“塞鸿飘渺长空远,羌管悠扬野草秋”等脍炙人口的诗句,千百年来广为流传。

秀美飞动 汉隶典范

□ 周惠斌

汉《曹全碑》全称《汉郃阳令曹全碑》,有“汉碑中的精品”“汉隶中的代表”之誉,刻立于东汉灵帝中平二年(185年)十月。明代万历初年,出土于陕西省合阳县旧城莘里村,其时篆额已不存,但碑身完整,字体清晰,不缺一字,殊堪称奇,后移存至合阳县孔庙东门内。清代康熙十一年(1672年),碑身断裂,所刻之字因此出现缺损,但仍不失为汉碑中保存汉隶字数较多的一通碑刻。现收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馆。

《曹全碑》呈竖方形,高272厘米,宽95厘米,由晋代王敞等为纪念曹全的功绩而立,王敏、王毕等立石。碑阴凡20行,行45字,内容记述郃阳令曹全为弟分忧,弃官还乡,因遇禁烟,隐居于家,光和七年出任郎中拜酒泉禄福长等身世,此外记载了以张角为首的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声势浩荡,波及陕西等情况,为研究东汉末年的农民起义提供了重要史料。曹全字景完,敦煌效谷人,侍亲至孝,任时恩泽广被,同僚颂扬高德。

正文末有铭辞3行,3字为句,空3行书年月一行。碑阴5列:首列一行,二列26行,三、四列,清代王昶《金石萃编》记载为8行、18行,民国欧阳辅《集古求真》则记载为5行、17行,五列4行,皆刻隶立碑和题名者,包括处士、县乡三老、门下祭酒与议掾、督邮、将军令史等人的名字。因碑文中多有别字,后人因此疑之为系后世好事者所摹刻,然而仅其端直朴茂状,显然非汉人所不能及也。

《曹全碑》堪称汉隶中圆笔书写的典型、秀美一派的典范。碑文结体匀整,笔势流畅,字距疏朗,行距紧凑,笔法严谨,结构舒展,风格秀逸。文字体态扁平,左右伸展,下部开张,工整精细,外柔内刚,逸致翩翩。用笔圆润精美,秀丽兼备,自然流畅,波磔鲜明,转折处已多见行书笔意。字型匀整秀丽,道美质朴,充分显现出汉隶渐趋成熟及稳定的书写技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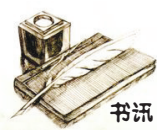
由于《曹全碑》出土晚,存字多,写刻精,法度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曹全碑》拓本

严,影响大,不仅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极高的艺术价值,而且历来是习写汉隶的首选,清代万经对它推崇备至,赞叹为:“秀美飞动,不束缚,不驰骤,洵神品也。”

现由国家图书馆收藏的《曹全碑》拓本,为明拓“悉”字未损本(首行“秉乾之机”之“乾”字未穿,第九行“悉以薄官”之“悉”字未损),经清代学者朱彝尊、金石家翁方纲和近代梁启超等递藏,传承有序。内框高25厘米、宽11.5厘米,外框高31.5厘米、宽16厘米,计21行,拓印黑明,如涂油脂,光可鉴人。内有翁方纲题签“曹全碑曝书亭藏本”,并钤“覃溪鉴藏”朱文长方印;外有梁启超题签“朱竹垞旧藏本曹全碑,今归饮冰室,己丑正月题”;此外有赵怀玉题跋、李彦章观款,另钤有“朱彝尊印”“彝斋”“竹垞”“翁方纲”“文澜阁校理翁方纲藏”“启超”“梁”“饮冰室藏”,以及“子孙后世家传之宝”“汉筹之印”“苏斋金石文”“容斋清玩”“叶志洗审定记”“东卿过眼”“李彦章印”等印章,蔚然可观。



《肃北文史》(第十辑)出版

近日,由肃北县政协编辑的《肃北文史》(第十辑)出版。《肃北文史》(第十辑)收录反映自治县建县以来历史发展变化、艰苦创业和民族风情等方面史料文章20篇,约12万余字,分“历史回眸”“往事追忆”“发展漫笔”“重大事件”“民俗风情”“红色记忆”6个篇章,并插入相关照片,力求图文并茂。

肃北县政协希望通过编辑出版文史书籍,进一步发挥存史、资政、团结、育人作用,传播好声音,传递正能量,引导各族儿女增强发展信心,凝聚共创力量,昂首阔步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迎接党的二十大和省第十四次党代会的召开。(赵重庆)